

村富论

1978—2006年北京郊区40个村庄调查

陈雪原◎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村 富 论

——1978—2006 年北京郊区 40 个村庄调查

陈雪原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富论: 1978~2006 年北京郊区 40 个村庄调查/陈雪原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095-6661-9

I. ①村… II. ①陈… III. 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调查研究-北京市-1978~2006 IV. ①F3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9990 号

责任编辑: 周桂元 牛婧丽
封面设计: 逸品文化

责任校对: 杨瑞琦
版式设计: 董生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 15.75 印张 236 000 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ISBN 978-7-5095-6661-9/F·535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88190492, QQ: 634579818

【自序】

集体经济、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的奇迹”。然而，在繁荣背后，有一类组织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甚至羞羞答答，与市场若即若离，也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保护，却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被基层同志誉为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锅底”——乡村集体经济组织。2014年，北京市有3967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195个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300多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中，不仅包括农业户籍人口，还有约50万的转居人口。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的临界点，城市功能和产业开始加快向乡村地区转移和扩散，为农村地区的复兴带来了契机。一些集体经济发达村的组织成员的子女考上大学后仍保留着农业户籍；一些征地“转非”人员也争取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非转农”现象。一时间集体经济成了香饽饽。另外，北京市还有将近一半的村集体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甚至已经资不抵债，且集体经济这种非均衡发展的趋势呈现日益固化格局。拓展集体经济发展新空间，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为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提供有力支点。

继中央提出“城乡统筹”“重中之重”“两个趋向”等一系列“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之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将改革与发展的目光进一步聚焦到农村地区。这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定阶段、以及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具有的特殊性要求，即单纯地调整城乡分配格局不足以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实施基于农村的发展战略。有必要较系统性地开展村庄发展理论研究，重点总结村集体经济贫富分化的特点，探讨其走向，为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奠定理论基础。于是，有了这本《村富论》。

擎此大名，既是出于此类著作至今尚付阙如，更是想要说明：村庄发展，不仅要户富、还要村富，要以集体经济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与转型升级。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推动村庄整体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修几条宽敞的马路、盖几栋漂亮的公厕。

北京市自新农村建设伊始就提出了“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近几年又提出了“新三起来”，即“让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乡村硬件设施完备后，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产业发展与产业组织培育的逻辑原点上，这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通过探求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让农民能够以集体经济为载体有组织地实现城镇化。在“三农”研究方法论上，将研究对象由“户”上升到“村”，再上升到“镇”，发挥乡镇级集体经济龙头的带动作用，拓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空间，这样才能契合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资源禀赋特点，而不是局限在农户这个传统分析的狭窄视域里转圈，陷入“黑板经济学”从概念到数据的循环论证，找不出路径，虚掷了光阴。

近年来，一些地方由于对村集体贫富分化演变趋势和规律性认识不清晰、部门之间缺乏统一步调，导致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时序、重点和力度把握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受到质疑、甚至诟病，出现了所谓的“修好路后挖地下管道开膛破肚”的“拉链式工程”，甚至一些地方还产生了严重的“小官巨腐”现象。新农村建设的中国实践，需要有在中国体制背景下，揭示村庄发展规律性特征的“村富论”。“为什么有些村庄富裕，有些村庄贫穷”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优化财政投入方向、产业发展布局，特别是做好村庄体系规划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较快，遇到了其他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凸显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些实践探索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总结北京郊区村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全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垫上一块基石，少走些弯路，跨越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卡夫丁峡谷”，由传统社会顺利进入现代社会。

本书在农村地区基本的空间单元——村庄层面上，从农户收入和村集体积累两个角度，探讨村庄的演变趋势、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考虑到村庄形态各异、经济体量小、易受内外部变量冲击、短期发展变化具有偶然性等因素，书中选取了北京郊区位于城乡接合部、平原和山区的40个村庄，在1978年、1988年、1998年和2006年四个时点，使之构成跨越2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论证村庄类型演化的基本趋势及影响因素，并引申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含义。

全书包括三部分，共计十章。

第一部分是问题提出，包括三章。第一章是“引言”，在这里阐述了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及面临的主要困局，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村庄贫富差异的演化趋势是什么？村际收敛的影响因素和条件是什么？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含义？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综述了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

设的相关文献与理论观点。

第二部分是假说证明，包括五章。第四章针对“引言”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论述了村庄在经济总收入、人均收入、人均所有者权益以及人口规模等方面发展差异的演化趋势，由此提出了关于村庄发展的假说。第五至七章针对第二个问题，分析了村庄间在收入水平和积累水平上的收敛性质，对村庄人口规模趋异给出了实证解释，揭示了村庄分化演变的基本趋势。研究发现：从增长速度看，村庄收入水平和积累水平均存在收敛特征，即更穷的村庄增长更快，区位、村班子素质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可以解释村际收敛的速度差异。从相对离散程度角度看，村庄人均收入水平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村庄积累水平则趋于不断扩大，其中平原地区分化最明显。两大指标收敛趋势差异导致村庄由“高积累，高收入”“高积累，低收入”“低积累，高收入”和“低积累，低收入”四种类型向“高积累，高收入”和“低积累，高收入”两种基本类型演化。前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水平，逐渐成为人口净流入村。后者相反，逐渐成为人口净流出村。可见，能否实现村富是村庄人口规模变动趋向的关键影响因素。第八章基于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村庄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村庄类型划分和衰落预警的参照依据。

第三部分是结论，包括两章。第九章以村庄间经济收敛和空间要素集聚为主线，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收敛与集聚路径以及基于空间区位的政策组合。第十章给出了全书的结论。

本书在理论研究层面，总结了经济转型期村集体积累分化的动态演变趋势，丰富了村庄类型学；揭示了村集体经济收敛的性质，将收敛理论研究拓展到村域经济层面；分析了村庄人口规模趋异的趋势及影响因素；建立了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为村庄体系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该书是我在201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修改完成的，出于敝帚自珍，姑且作为自己对“三农”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首次阶段性小结。多年来，浓厚的学术情结让我选择了一条文化苦旅，百折而不回。读博期间，经常骑自行车去国家图书馆借书、再去北大复印、然后去北大取书、去国家图书馆还书、再借书、再印书，如此循环往复。赶上周末，还可以溜达到北大旧书市，再顺路淘些宝贝带回。偶尔也会赶上大雨被截在半路，看着过往车流，或木然、或遐想，而这些如果与青少年时期的农田劳作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我生于农村，大集体时期即开始帮着生产队拾麦穗，单干后更多地参加农业劳动，从事拔草、牵墒、压地、捉虫等力所能及的田间劳作，在密不透风的玉米秆丛中削顶打叶，在午后炎炎烈日下的泰地里挥锄除草，在雨后泥泞的田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拉纤播种撒肥，凝练出“老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品格，更在骨子里刻上一份浓重的“三农”情结，历久弥深。当然，那时心里盼的更多的还是能够离开农村、考上大学、转非，摆脱春夏秋冬轮回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但是，又有谁会对自己挥洒过的汗水轻易忘怀呢？1994年接到河北农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我在床头沐浴着清冷的月光，久久不能入眠，要当一名“农业经济学家”的梦想油然而生。迄今，恍惚间整整二十载过去，如何让农民团结起来、富裕起来、自信起来，一直是自己心灵世界里的“哥德巴赫猜想”。然成果乏善可陈，聊以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三农”研究路上留下的一个脚印，激励自己继续埋头攀登吧！



于北沙滩7号院

201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缘起	(2)
(一) 中国村庄发展的体制性特征：“另外一个户籍制度”	(2)
(二)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及目前存在的两个困局	(10)
(三) 三个基本问题	(13)
二、研究设计	(15)
(一) 研究思路	(15)
(二) 调研数据	(18)
(三) 研究内容	(25)
(四) 研究方法	(27)
三、研究意义	(28)
(一) 理论意义	(28)
(二) 实践意义	(29)
第二章 文献综述	(31)
一、关于村庄发展的趋势性研究	(31)
(一) 村庄经济模型	(31)
(二) 中国的村庄发展	(33)
二、解释村庄差异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34)
(一) 穷国与富国	(34)
(二) 国家或地区间的收敛性质	(36)
(三) 农村内部的差异	(36)

三、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战略研究	(38)
(一) 国外研究情况	(39)
(二) 国内研究情况	(43)
(三) 新农村建设	(45)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48)
一、理论基础	(48)
(一) 收敛理论	(49)
(二) 发散理论	(50)
(三) 增长的计量经济学理论	(55)
(四) 倒 U 形理论	(60)
二、概念界定	(62)
(一) 村庄	(62)
(二) 村庄发展	(66)
(三) 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78)
第四章 村庄发展的特征事实：假说的提出	(81)
一、村庄发展差异演变的历史考察	(81)
(一) 总收入的增长与差异演化特征：俱乐部收敛	(81)
(二) 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差异演化特征	(88)
(三) 人均所有者权益的增长与差异演化特征	(93)
(四) 村庄间人口规模变化特征	(101)
(五) 其他变动特征	(107)
二、村庄间差距的解释：静态分析的视角	(108)
(一)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08)
(二) 村庄治理对村庄之间差距的解释：倍差法	(111)
(三) 一个典型案例：丰台区王佐镇南官村	(116)
三、村庄类型的动态演化模型：一个假说	(119)
(一) 村庄发展的基本路线：市场发育与村庄专业化	(119)
(二) 村庄类型的动态演化模型	(120)

第五章 村庄间收入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123)
一、穷村与富村收入增长速度差异	(123)
(一) 模型及变量设定	(124)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128)
二、村庄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变化	(137)
(一) 村庄间人均收入相对差距变动的基本特征	(137)
(二) 村庄间人均收入相对差距的分解	(139)
三、小结	(142)
第六章 村庄间集体财富积累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144)
一、穷村与富村财富积累增长速度差异	(144)
(一) 模型及变量设定	(145)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149)
二、村庄之间的积累水平相对差距变化	(159)
(一) 村庄间积累水平相对差距变动的基本特征	(160)
(二) 村庄间积累水平相对差距的分解	(162)
(三) 对比：收入与积累差异的“剪刀差”	(164)
三、小结：关于假说的证明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含义	(167)
第七章 村庄人口规模趋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169)
一、村庄人口变迁之谜	(169)
(一) 人口迁移的原因	(170)
(二) 人口不迁移的原因	(172)
(三) 位置效用方法：村庄人口的净流入与净流出	(173)
二、计量分析：村庄间人口规模趋异的解释	(176)
(一) 变量及方法	(176)
(二) 村庄成为人口净流入村的主要影响因素	(179)
(三) 村庄成为人口净流入村的其他影响因素	(181)
三、小结	(184)

第八章 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	
方法	(185)
一、相关研究及问题	(185)
二、指标体系建立的要求和原则	(188)
(一) 基本要求	(188)
(二) 基本原则	(189)
三、模型及预处理数据的分析	(190)
四、计算与分析	(191)
五、政策应用：村庄发展预警	(202)
第九章 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204)
一、收敛路径	(204)
(一) 加快城乡规划一体化进程	(205)
(二) 推进村庄的产业升级步伐	(206)
(三)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207)
(四) 探索镇级统筹的新形式	(208)
(五) 提升村干部队伍素质	(209)
(六)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210)
二、集聚路径	(211)
(一) 村庄城市化	(212)
(二) 村庄城镇化	(213)
(三) 村庄专业化	(213)
三、政策组合	(214)
(一) 城市化社区	(216)
(二) 城镇化社区	(217)
(三) 新村化社区	(218)
(四) 空心化社区	(219)
第十章 结论	(220)
一、主要发现	(220)
(一) 村庄发展差异演化的基本特征	(220)

(二) 村庄发展差异的收敛性质及影响因素	(221)
(三) 村庄间人口规模趋异的影响因素	(223)
(四) 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224)
二、创新点	(224)
(一) 揭示了村庄类型的动态演化特征	(224)
(二) 验证了 β -收敛和 δ -发散并存的可能性	(225)
(三) 把集体经济纳入村庄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	(225)
(四) 提出了村庄衰落的预警机制	(225)
三、下一步研究方向	(226)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7)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被深深地打上了改革与发展的烙印。前者，主要体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农村地区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与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变革；后者，主要表现在国家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收入水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快速跨越。然而在这一进程中，收入分配逐渐走向了不均等，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内部，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1981—2002 年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增长了 2.8 倍，远大于城乡差距的增幅（黄祖辉等，2005），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国内学者从宏观层面对农村地区内部差距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朱玲，1992；张平，1992；张平，1998；魏后凯，1992；魏后凯，1996；白志礼等，1993；等），一些学者瞄准农村基本生活和社会关系单元的村庄，进行村内和村际收入差距的微观研究（如，Rozelle 等，1995；黄祖辉等，2005；吴仲斌、宋洪远，2008；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村庄差距本身变动趋势和其影响因素的揭示，而关于村庄间差距变化对村庄长期发展影响及村庄类型分化演变等方面需要做更系统性的研究^①。

^① 关于城乡与区域差异的研究一般是从收入角度进行宏观分析。本书研究的特点：一是属于以村域经济为单元的微观研究，便于研究对象的具体化；二是从收入与积累两个角度解析村庄财富的收敛性质。集体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村庄经济具有区域经济的一般特点，也具有自身的特殊的运作机制，其本质上是一种以土地为组带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生产者和所有者合一的特点。为此，本书对从收入角度分析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拓展，从收入和积累两个角度研究村庄发展的差异性及收敛性。

自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新农村,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完成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关键性意义。然而,由于农村地区幅员辽阔,面对着300多万个自然村落,大小不一、高度分散、有穷有富,新农村建设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伴随农村城镇化,居民点数量逐渐减少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共同现象(白有光等,1993)。中国平均每年要消减2万多个自然村落,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要“拆多少,并多少”将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陈锡文,2007)。新农村建设既不可能由政府财政统揽,又不能指望村村发展。要实现各个方面的趋同,应遵循村庄自身的资源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区分,做到“因村施政”。为此,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村庄进行类型划分,明确村庄发展的长期定位,做到“新农村建设,规划先行”。本书宗旨是要通过对村庄分化演变趋势的归纳总结和实证分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缘 起

“为什么一些村庄能富裕起来,一些村庄逐渐走向衰落?”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解释村庄发展差异及演变趋势的原因,进而对不同村庄进行类型定位,这也是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 中国村庄发展的体制性特征:“另外一个户籍制度”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说,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要素报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资本和劳动在 market 需求的牵引下会自动向能产生更高边际生产率的地方转移,进而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寻找劳动,可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兴起,甚至新兴市镇的产生,而劳动力寻找资本,则是传统城镇化的一般路径和形式。按照一般发展经验,要素的流动在起始阶段会扩大地区间差距,但差距最终会缩小,实现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而真实世界中要素的流动,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抑制了要

素在地区之间回报的趋同，并使地区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甚至扩大。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型的过程中，制度性障碍短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与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形成了村庄发展的体制性特征。

1. “村自为战”的分割式发展格局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把精力主要集中于用城乡二元结构来解释农村的贫困原因（蔡昉，1989；陆学艺，2000；等），即城乡之间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分割使得农村地区难以向城市地区收敛，城乡之间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分析范式可以解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难以解释农村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包括村庄之间的收入差距。因而有必要分析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的另外一类制度障碍：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要素市场分割体制，这主要来源于传统村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封闭特性。农村地区内部差距的拉大，不仅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即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①的前半段，还是中国经济体制特殊性的表现，即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农村村庄之间的条块分割引起要素配置上的低效率。

在农村地区，与城乡分割体制类似，由于传统集体经济的产权封闭性造成了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市场分割，形成另外一种“户籍制度”。一方面是“村自为战”条件下，资源配置空间狭小，要素难以实现空间整合与集约利用，产业结构低端，应该缩小的差距未能缩小，应该集中配置的要素未能集中，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另一方面，由于传统集体产权的共有性特征，农民也不能带着集体资产进城，这降低了农民市民化成本负担能力，导致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滞后。

集体经济组织脱胎于新中国成立时合作化运动中的高级社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

^① 据一般发展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从工业化初期过渡到中后期，收入不均等水平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倒“U”形曲线变化过程。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1期。

发生深刻变化，北京市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乡农工商公司^①、村经济合作社及农户家庭的三层架构。在部分地区，乡级集体经济已经名亡实亡，村庄集体经济则明显弱化，其原有经济功能往往由村民委员会代为承担。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其成员以土地资源的公共占有为纽带组织在一起的，与村庄的地域空间完全重合，形成了封闭的产权结构。加之集体内部产权不清晰，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难以进行跨村流转和集中配置，发展各类产业项目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和要素只能来自本村，形成了“村自为战”的发展格局，呈现出“乡办企业在乡，村办企业在村，户办企业在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的工业化现象。同时，由于农民难以融入城镇，在城乡之间来回摇摆，出现了“乡乡建镇，村村建镇，户户盖房”的“农村病”。

就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而言，一个村庄的农户不能随便改变户籍融入城镇（除非通过婚嫁或经当地村民代表会同意），也不存在融入另外一个村庄的可能。如有一个村办企业招收了外村（通常是邻近村庄）的村民就业，该村民只能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通常不会享受到村里的各项福利待遇。

土地要素在村庄之间的流转则更为困难。这种体制下新的城镇难以发育，“农村病”只能愈演愈烈，城乡接合部地区最为明显。该地区的村庄在进行城镇化转型过程中，村民要进行“转工转居”^②，村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社区化改造和建设，以适应城镇化管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倾向于采取每个村都规划一块建设用地，由村集体单独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协议出让方式进行开发建设，而选择地块的时候往往采取绕着走的方法，选择开发成本较低的地块进行开发，留下了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造成项目开发与整体规划相脱离，环境脏乱差，急需进行区域整体改造。目前，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城乡接合部50个重点村改造，由于特殊地区的改造成本高，资金难以平衡，只有打破村庄界限，通过地区之间土地收益的资金联合与综合平衡的方式来解决。近年来，丰台区卢沟桥镇集中了乡农工商

^① 北京市虽然后来大部分乡镇实行“三改二”，乡农工商公司撤销，将乡镇党委、乡镇政府、乡农工商公司“三驾马车”改为“两驾马车”，但乡级集体资产规模一直占据了乡村集体总资产规模半壁江山。

^② 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农民转为居民，其实质是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型。